

王巍 主编

考古学人



访谈录

I



考古学人

王巍 主编



访谈录

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学人访谈录·I / 王巍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325-7180-2

I. ①考… II. ①王… III. ①考古学家—访问记—中国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0466 号

考古学人访谈录

I

王 巍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225,000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5325-7180-2

K·1845 定价: 4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董新林 /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何 努 / 四千年前的都城记忆	17
刘庆柱 / 弘毅笃志,长乐未央	39
刘一曼 / 情迷天书,心醉考古	71
仇士华 / 中国碳十四年代学的始创者	91
佟柱臣 / 神州踏遍觅新知 史前边疆均立言	115
王仁湘 / 行色匆匆,味趣悠悠	139
王 巍 / 探索中华文明源流 提升中国考古地位	161
王仲殊 / 专精汉唐考古学 兼通中日交通史	197
巫新华 / 从新疆来,到新疆去	217
张长寿 / 商周考古纵横谈	239

考古学人访谈录
董新林



2008年主持发掘辽祖陵甲组建筑基址

简介

董新林,男,1966年9月生于辽宁绥中。1989年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本科;1993年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考古系硕士。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内蒙古第二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内蒙古赤峰市第六届人大代表。

学术专长: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重点为辽宋金元明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比较研究。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其中主持的辽祖陵甲组建筑基址等考古发掘项目,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的“2008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辽祖陵黑龙门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中国田野考古发掘最高奖项——国家文物局“2009—2010年田野考古发掘奖”一等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次获得的一等奖。主持发掘的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荣获“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至今共出版考古学论著5部,发表中篇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等共50余篇。主要有:专著《救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合著)、《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幽冥色彩——中国古代墓室壁饰》、《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墓室壁画全集3·宋辽金元》(第一主编);论文《高台山文化研究》、《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略论中国古代墓葬形制的演变》、《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论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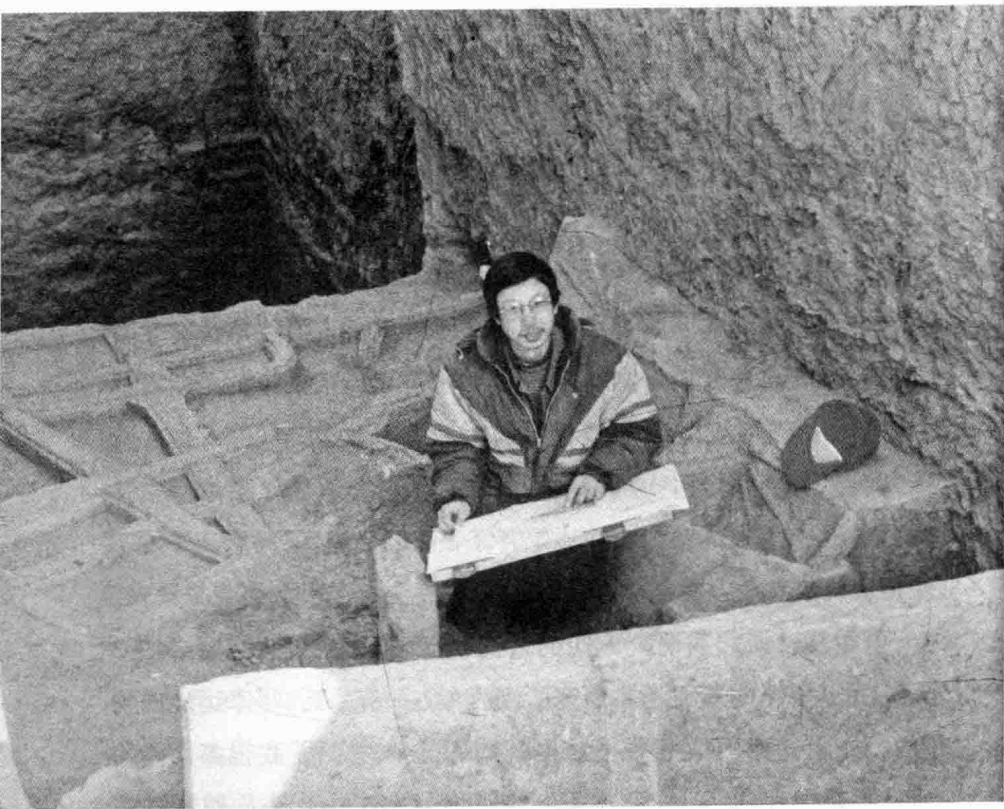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董新林先生访谈录

采访者: 王 睿

王 睿: 董老师您好! 首先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 看到您的经历, 感觉您从事的考古研究时间跨度挺大的。您最初学习的是商周考古, 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 有一段时间从事的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 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98 年以来, 您主持了不少辽宋金元时期的考古发掘, 并进行了相关研究。在您所主持发掘的辽祖陵陵园考古工作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同时您还写出了《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这样的专著。这些转变您是如何完成的?

董新林: 谈起我研究方向的转变, 说起来有些机缘巧合。1993 年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后, 很幸运地遇到了两位先生, 他们给我提供了难得的锻炼机会, 并给了我很多具体的指点, 我从中获益匪浅。其中第一位是内蒙古工作队队长刘晋祥先生。刘先生为人有口皆碑, 他很注意提携后进。刚进内蒙古队不久, 刘先生就安排我协助他编写敖汉赵宝沟考古发掘报告。刘先生放手让我自由发挥, 使我有了一次难得的学术历练。本来《敖汉赵宝沟》专刊完成后, 我计划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 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进行一系列青铜时代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但是, 考古所当时决定



1992年在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发掘

要编写多卷本《中国考古学》，而我们研究室没有搞宋元考古的青年学者，所以《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的主编孟凡人先生就安排我承担墓葬部分的撰写任务。这是我要感谢的第二位先生。孟先生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考古研究领域，一个全新的学术平台。

王 睿：也就是说您从先秦时期的考古研究一下子转到了宋元时期的考古研究。这转变很大。感触很多吧？

董新林：是啊。起初我不想接这任务。一来觉得与自己的学术专长不搭界，跨度太大；二来觉得要重新学很多历史文献知识，难以胜任。实际上是有点畏难情绪了。一切从头开始是很难的。但在孟凡人和刘晋祥等先生的鼓励下，年轻人的血性起了作用，我硬着头皮踏上了新的研究征程。我从收集基础材料入手。在整理和消化材料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辽宋金元明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基础十分薄弱，其中有很多的学术空白点，是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同时，我也意识到辽宋金元明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难度很大，因为它要涉及历史文献、古建筑、佛教和瓷器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个富有挑战性的新领域，使我越来越有了探究的兴趣。这让我决心将自己的研究重心，从先秦时期主动转移到辽宋金元明时期。这应该是我学术生涯中一次很重要的抉择。

现在，回想起学术转型的头几年，仍然能回味到当时的研究苦楚。我记得，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主要精力都用于收集和熟悉辽宋金元明时期的考古材料，写不出新的研究文章，那种着急痛苦的感觉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或许是不服输的个性吧，当时尽管痛苦，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向年长学者虚心求学问道。所内外诸多老先生和学长都给予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我一直铭记于心。他们一再叮嘱我，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是慢工出细活。

所以,我一度不敢发表新论文。好在还有几篇先秦时期的考古旧稿陆续刊发。最晚的一篇先秦时期的考古论文,是2000年在《考古学报》发表的《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有时候放下重新开始,需要很大的勇气。

王 睿: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您考古学道路的一个标志,此后您的研究文章多是宋元以后的内容了。

董新林:对,可以这样说。进入新世纪,我开始斗胆撰写辽宋金元明时期的考古学论著。迄今为止,出版了3本书,发表了30余篇历史时期的文章,侧重于历史时期陵墓、城址和墓室壁画等方面的内容。学术转型的这段经历,对我个人的研究颇有裨益。我现在喜欢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进行考古学研究,对研究内容进行历时性的比较分析,从而更能清楚地了解其来龙去脉。

王 睿:现在很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当工作内容和自己的专业方向、兴趣不一致时,很多人会有点茫然,您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董新林:这个问题不太好讲。对于考古所这样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科研机构来说,每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都应该尽量做好两点: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研究重心。我想能来我们所的青年学者,特别是硕士或博士生,通常都会有自己较为明确的研究方向。其次,工作需要与研究方向不一致时,要尽量找到它们之间的契合点。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然是很惬意的。实际工作中,工作内容和自己原来的研究方向不一致的,做起来不是特别顺手,也是肯定的。若确实感到茫然,我觉得应该找相关领导及时解决自己的困惑。否则,对自身和考古所都没有好处。说到这里,我想,这个问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部门负责人,应该对每个人的特长有所了解,能知人善用,为年轻人搭建施展才干的平台,这样会有利于培养专门人才。另一方面,

年轻学者也要敢于挑战自我,多接触一些,扩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这样或许更有益于自身的成长。就我们汉唐考古研究室来讲,不同的研究专题如都城、陵墓、窑址及瓷器、古建筑等,或许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思考方式,但彼此互相借鉴,对于从事长期的学术研究是有益的。

王 睿: 最开始您有一个规划吗?比如说一个十年的规划?

董新林: 我自己的研究一般是有规划的。说十年有点长,五年规划还是有的。我本科和研究生的毕业实习都是在辽宁从事先秦时期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所以我到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后,便计划继续深入探究燕山南北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的格局和演变。这个设想得到了当时考古所领导和研究室领导的支持。后因《中国考古学》课题的启动,没能实施。

开始从事辽宋金元明考古研究时,我也勾勒了大致的规划。从1996年开始,我担任了内蒙古工作队队长。自然我的田野发掘要立足内蒙古地区,辽代考古发掘工作顺理成章地成为我的首选。我设想通过对辽代陵墓、城址等的系列考古发掘和研究,来构建辽金考古学体系。于是,1998年我开始在内蒙古赤峰、通辽地区调查辽墓。从1999年起,在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中,我具体主持了内蒙古扎鲁特辽墓发掘和辽上京城皇城试掘等工作。

王 睿: 近四年,您都在从事辽祖陵考古研究,目前发掘工作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您能具体谈谈辽祖陵的工作情况吗?

董新林: 辽代帝陵考古是辽代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选择辽祖陵遗址开展工作,主要出于三点考虑:第一,辽祖陵是辽代第一个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这是辽朝帝陵开先河者,对后代影响较大。从这个角度讲,辽祖陵遗址对于研究辽代早期陵寝制度



2012年在辽上京皇城西山坡考古工地现场研讨(左为董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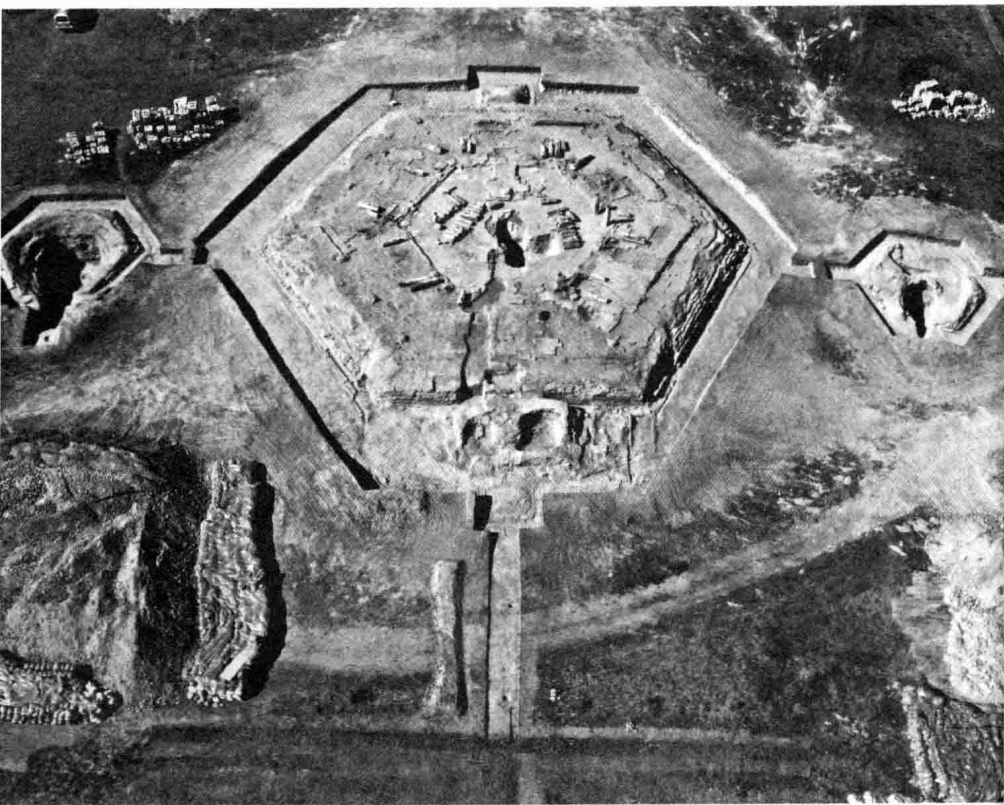
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辽代早期陵寝制度研究是很重要的学术课题,但目前还是个学术空白。辽祖陵遗址保存状况很好,便于考古发掘和研究。第三,辽祖陵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的考古工作,可以为制定辽祖陵大遗址保护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因此,我于2003~2004年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取得了重要收获。鉴于辽祖陵遗址的重要价值,在王巍所长的协调帮助下,辽祖陵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从2007年起,我所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我是发掘领队,开始对辽祖陵遗址进行一系列的重点发掘,取得了诸多重要的考古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赞誉。经过为期四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基本搞清了辽祖陵陵园的主要形制布局,诸多重要发现与《辽史·地理志》记载吻合。这是第一次从考古学上确认辽祖陵陵园的存在。辽祖陵遗址的考古工作无疑是迄今辽代考古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补记:2010年辽祖陵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的最高奖项——国家文物局“2009—2010年田野考古发掘奖”一等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次获得一等奖殊荣。)

王 睿:目前辽祖陵的后续工作是什么情况?

董新林:辽祖陵考古发掘暂告一段落。后续工作是整理和编写考古发掘报告,我计划三年内完成,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力求辽祖陵考古发掘报告能有所创新,尽量体现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我主张按单位发表资料,客观完整地公布材料。我的报告,是以读者的视角来编写的,目的是让读者更方便地利用资料。考古报告是给别人看的,不能只有自己读得懂。

王 睿:我们期待您的精彩报告!



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3个塔基)发掘工地全景(下为东,气球照片)

董新林：谢谢！

王 睿：在辽祖陵考古发掘工作中您有遇到一些困难吗？又是如何克服的？

董新林：一个考古发掘项目，会涉及诸多方面，是个系统工程。辽祖陵考古发掘，得到了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总的来说很顺利。但是一些具体的困难在所难免。诸如地方关系协调、民工劳资纠纷、安全保卫和遗址保护等等。作为考古发掘领队，必须想办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王 睿：也就是说一个考古领队，应该具备一些综合素质。您觉得年轻学者要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领队，应该怎么去准备呢？

董新林：没错，领队需要具备综合素质。对这个问题，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觉得，一个好的考古领队，需要几个方面的基本能力：首先，要有一个科学求实的态度。其次，要有扎实的考古发掘技能，这是工作质量的保障。再次，要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包括组织专业人员、管理民工等等。再次，要有团结协作的意识。考古发掘工作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要通过与同事的合作、与地方所的合作等来完成。最后，还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田野发掘是件既辛苦又寂寞的差事。尽管现在发掘条件不断改善，但是野外作业不可避免要忍受风吹雨淋和酷暑严寒。有人笑谈，做考古，不需要太聪明的人，中才足矣。也许聪明人多不愿意吃苦受累吧。

王 睿：辽代考古工作渐成热点，您的下一步工作与都城考古工作有联系吗？

董新林：有。我很高兴，从2011年开始，我开始主持辽上京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在“十二五”

期间,我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始发掘辽上京城城址。辽上京城是中国游牧民族在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辽朝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也曾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对辽上京城的发掘有着非常重大的学术意义。根据以前的试掘情况,我们确知上京城址是一个辽金两朝相叠压的城址。如果想对辽上京城有一个清楚准确的认识,就必须先剥离上层的金代遗存。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极具挑战性。我想我们会按照考古发掘的基本原则,遵循辽上京大遗址的保护理念,尽量进行细致的考古发掘,力求逐步解决辽上京城的诸多学术问题,推进辽上京城的遗址保护和学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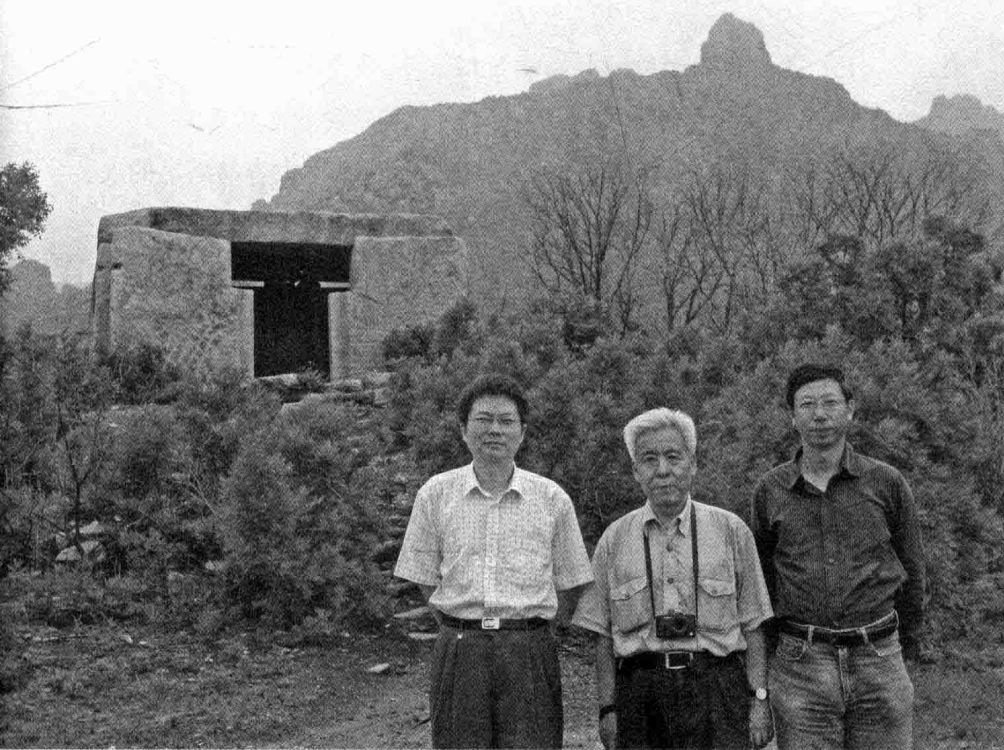
(补记:董新林主持发掘的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荣获“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王 睿:您一直在田野考古第一线从事发掘工作。您常说,要带着明确的学术目的进行考古工作,但若碰到一个非主动发掘的项目,也是如此吗?这如何具体体现呢?

董新林:考古发掘项目不是单纯的田野发掘,而应是课题研究的一部分。在确立一个考古发掘项目之前,一定要考虑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其答案应该就是你的学术目的。一个领队发掘前肯定要有个规划,我的课题研究要到什么程度,发掘可以解决什么问题,等等。即使是基建项目,也要根据掌握的线索,通过细致科学的发掘,力争解决学术问题。

王 睿:这样会不会太主观,就是预先想的和发掘出来的东西差很远呢?

董新林: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考古作为实证科学,允许出现这样的偏差。但这和要有明确的学术目的不矛盾。发掘现象与原先设想不同,那就按考古发现重新定位。何况,很多发掘的学术目的是



2011年7月陪同宋德金、刘浦江二先生参观辽祖州城遗址(右为董新林)